

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

■ 袁宝华



1990年7月本科生毕业典礼后,袁宝华老校长与1986级本科生代表在八百人大教室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衡虹、汪华、李晓希、张升、蓝霞、甄秀梅、程涛、王雪梅、刘祥元、郭海鹰。

1952年,我随周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到莫斯科参加商谈并确定苏联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我在苏联前后生活近10个月,这10个月的日日夜夜至今仍历历在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一方面,要治理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支援前线。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1951年经济恢复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时,根据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中财委于1951年2月开始试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需请苏联援助和帮助建设的项目。在当时,竭尽全力进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争取苏联对我国的经济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中央为了搞好与苏联对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决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计划领导小组工作,具体负责的是中财委计划局,当时计划局人不多,就从各大区抽调人员参与这项工作。1952年7月25日,我从东北赶到北京,立即同即将前往苏联谈判的同志一起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在临行前的20多天中,我们以继日地讨论项目,列设计项目表,写设计项目说明,做设计项目和设计清单,写地质勘查资料和清单,提出专家与设备要求和技术要求等。同时,还要准备好“一五”计划的总说明、计划方针和计划概要,详细推敲重工业计划。我们所准备的材料必须统一、准确。

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做好了赴苏联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我国政府代表团在1952年8月15日晨5时离开北京。代表团正式成员共5人:周恩来任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任副团长,成员是张闻天(驻苏联大使)和栗裕(副总参谋长)。代表团的顾问都是政府和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代表团的随员也是各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翻译人员

等,我当时是东北工业部秘书长,是重工业部的代表,又是民用工业部门的代表。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我们就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认真准备和核对材料,学习和讨论苏联报纸发表的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当时,大家都急切想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想参观他们的工矿企业,学习他们的经验。从9月7日到16日,我们在莫斯科参观了苏联工业技术展览馆、建筑展览馆、莫斯科大学,考察了斯大林汽车工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制造厂及第一滚珠轴承厂、电缆厂、变压器厂、卡里伯厂、莫斯科煤气厂、吉那摩电动机厂等。之后,我们又到更多的企业参观学习。李富春指定由我带领搞工业的一行约20人到苏联地方企业参观。我们的日程排得很满,几乎马不停蹄。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苏联是计划经济发源地,是我们的“老大哥”。这个计划大纲,对我们这些刚刚从事计划工作的人,是难得的学习资料,为我国“一五”计划中拟请苏联援助的项目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我们更好地制定“一五”计划并坚定实现“一五”计划的信心,也是极大的鼓舞。

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结束到斯大林逝世的四个月,是我们和苏方准备谈判的紧张的四个月。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们提出的项目,大家几乎都要把谈的项目背下来了。我主要负责冶金方面的项目。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熟悉项目、准备谈判之外,我们还做了许多其它工作。一是接受国内的任务,与苏联外贸部有关人士商谈已确定的项目。这些项目后来都加进了中苏双方共同确定的156个项目之中。二是了解和听取东北工业

部派到苏联学习的实习生的汇报。当时东北工业部派去的实习生有八九十人,分布在各个行业和企业。通过他们,我们知道了不少苏联企业的生产情况和管理方法。

在正式谈判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从1月30日开始讲授,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我们20来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其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生产费和周转费”三章,以及开头两部分是我整理的,计划工作的组织和计划工作的方法是我负责审查的。这些整理的文稿后来汇集成《经济计划概论》一书,正式出版。

1953年4月初,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

我们当时的建设热情极高,主观上都想把劲鼓足,想多争取苏联的援助,所以做的计划比较大。例如铁路,“一五”计划草案提出5年修铁路一万公里。卡冈诺维奇是交通专家,他问:为什么一上来就修这么多铁路?我们说,我们国家同苏联一样,幅员广

大,地域广阔。他问:有那么多钢轨和枕木吗?如若这些苏联可以援助,但谁给你修这么多车站、上水装备、通讯设备?我们回答,请苏联给予支援。苏方表示,他们也负担不起,力所不能及。对此,李富春电话请示国内,很快收到回复,改为五千公里。

我负责冶金项目的谈判,谈判对手是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冶金工作的副主席。谈判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我们前后谈了20多次。他很认真,对每个项目都事先做研究,抠得非常细。我们没有搞现代化工业企业设计的经验,好多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特别是矿山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太粗,很难满足设计要求,许多矿山资料不完整,勘探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设计的需要,给项目和设计谈判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只好打电话把谈判情况报告中央,并请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到莫斯科,专门把我国对矿山进行的最新勘探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

每天谈判早出晚归,对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能为新中国建设做事是一种幸福,所以情绪始终是高涨的。谈判桌外,我们同苏

方各部门的人,也常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他们也很劳累,话里话外听得出来,苏方也有难处。用苏方人员的话说,中国是个大国,提的项目工作量大,接受这些项目就必须修改他们自己的计划,与援助东欧国家不同。苏方人员还说,援建中国的项目他们要根据进度供应设备,有些还要供应材料、派遣专家。据说为中国项目,仅设计单位他们就增加了3万人。

当然,正常的国家间谈判都应该是互利的,中苏谈判也如此。苏联也有求于我们,特别是苏联需要的战略物资,如稀有金属钨、锡、锑、钼、汞及天然橡胶等项目,谈判时进展较快。

谈判到4月中旬进入尾声。我们原设想由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150个,其中有60项苏方没有接受。理由:一是缺乏技术资料,二是中国自己可以设计,三是可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四是目前还没有能力建设,五是我们没有必要建设,六是苏联方面技术也不过关。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苏联政府提供的援助虽不是无偿的,却是真诚的。后来陈云也多次说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有的设备,苏联刚试制出两台,他们一台,给我们一台。为维护中苏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开始时,苏联将旅顺、大连交还中国。中长铁路两家共管多年后,交还中国。中苏合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也于50年代交还中国。作为友谊的象征,“一五”计划中有些项目的确定,我想也有对我 国补偿之意,因为战后苏军从我 国东北拆走了大量的设备。

谈判基本结束时,李富春派宋劭文回国向中央汇报。4月17日,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重点是与苏联新议定的91个项目和

原已决定的50个项目,一共是141项。对苏联答应援助中国的项目,以及苏联希望中国向他们出口一些稀有金属的要求,毛主席基本上表示赞同。这是中央第一次讨论五年计划。毛主席说,苏联削了的项目,有的缺乏地质资料,实际不能干;有的自己可以干,何必给别人干;有的可以缓干。削了大家都舒服了,削了我们的主观主义。五年计划完成、完不成,超额完成都有可能,我们必须完成,争取超额完成。钱多了,修铁路,办学校,为农民办事。

会议赞同中国在苏联设立经济参赞处,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

宋劭文返回莫斯科后,苏方应我方要求,正式提交了援建项目清单、减调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向苏出口物资的清单。4月25日下午,我们从苏联贸易部取回协定草案文本和附件,经过大家多次认真审查与核对,终于在1953年5月15日正式签订协定。中方参加签字的是李富春、宋劭文、我(代表民用工业)和钱之道(代表军事工业)。

在正式签订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实际施工的是150项)。这些项目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国防工业44项、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共10项。

协定正式签订后,我们整理资料回国,其它未了事宜则交大使馆办理。李富春由于要乘坐飞机回国,所以动身晚些。王世光、齐明、陈平和我们4个人,带着装满十几个箱子的大批资料,乘火车回国。我们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文由校史馆副馆长楚艳红根据《袁宝华回忆录》整理)

第一次科学讨论会

■ 李忠

1950年10月18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会议”隆重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规模空前,到会总人数824人,出席会议的不仅有本校领导、各部负责人、各系和教研室教师、研究生,还有首都科学界代表、清华大学等兄弟高校教授,以及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贸易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中央合作局、中央电影局、石油管理局、海关总署等政府各机关领导共计168人。

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目的,正如吴玉章校长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于反映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来在各种建设方面的成就。”吴老还说:“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今后我校科学工作的开展,提高我校教学工作者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指示如何使理论、科学和实际进行有系统的联系。”除两次全体会议外,本次大会设立了7个分会,分别是工业、财政、贸易合作、会计—统计、法律、外交、语言与教育,共进行了31场报告与讨论,主要涉及新中国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现实问题。

召开科学会议(档案记载多称“科学讨论会”)的最初设想是在1950年8月24日吴玉章校长主持的第十八次校行政会议上提出的,初衷是研究、总结教学工作,参会人员仅限于校务委员会成员。随着筹备工作的深入,会议的时间被数次推迟、规模显著扩大、议程逐渐丰富,其承载的意义也越发重大。

科学讨论会是我校科学研究工作的动员和发端。全校各系、各教研室踊跃参与,都推荐了优秀的研究论文,会上所作的31个报告都是经过何思敬、尹达、何干之审定,并经成仿吾副校长、吴玉章校长

最后确定的,600多名师生参加了会议。此后,科学讨论会成为“经常的系统的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科学讨论会是我校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科学讨论会召开之际,我校第一届本科生仅仅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学习,第一届进修科学生刚刚入学,选择此时召开如此规模的科学讨论会,表明我校建校伊始就把科研工作置于与教学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高度重视。1950年12月成文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简略介绍》,阐明了我校对科学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为了培养科学的教育干部和提高其科学水平,以及培养出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专家,因此,在大学内建设科学研究工作,就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我们一开始就注意这一工作。”学校设立和教务部并重的研究部,负责组织、领导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各系设立教学和科研一体的组织机构教研室,创办《教学与研究》《新闻与出版》《教师报》等刊物。

科学讨论会是我校“教学与实际联系”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高度评价了科学讨论会的现实意义,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了中国人民大学自其前身北大学就始终坚持的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在10月20日的总结大会上,吴玉章校长号召全校“必须加强与巩固理论和实际联系,加强与巩固科学工作者同各机关各企业工作的合作”。在会后的总结材料中,学校计划“在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到将来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还可以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进行专门业务的科学研究,直接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作者系档案馆退休人员)



艺术空间

新起点,新征程,新希望。8月24日是我校本科新生报到日,近三千名本科新生跨越山川湖海相聚人大校园,开启求学生涯的全新征程。

摄影/崔晨 姚伟康 彭椿庭 朱峰 冉皓文

